

助学贷款违约调查：就业难加剧还贷难

“到哪年才有钱还贷款呢？”

“才1800元，还是在上海，叫人怎么活呢。”在北京林业大学田家炳体育馆内的双选会上，计算机系的应届毕业生小吴一脸痛苦。在场内转悠半天，小吴好不容易跟一家单位达成意向，可一谈到起薪，小吴就有种想哭的感觉。小吴的家在江西老区，还有一个妹妹读高中，由于父母身体不好，四五年前就已经不能再做重体力活了，全家的收入就指望那几亩责任田。他从读高中就开始借债，到大学毕业时，小吴已经成了背着两万元债务的“负翁”，“到哪年才有钱还贷款呢？”

在我国，大学生违约还贷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那么多接受了16年教育的大学生违约还贷，是社会诚信的缺失，还是生活拮据的无奈？贫困学子还贷路上，到底走得有多难？在还贷中他们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近日，笔者对北京、广州、武汉、云南等地高校数十名大学期间借债的毕业生进行了采访，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感谢国家助学贷款让自己圆了大学梦”，但是，高额学费、就业的艰难，家乡父老的期待，三座大山重重压来，让他们尝尽生活艰辛。

就业难造成贫困生还贷难

“原以为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了，再穷也要读完大学，经过申请，自己贷到了两万元。没想到在毕业后饭碗都没搞定，咋还贷呢？”在北京市东五环的一处地下室，何亮焦虑地等待着面试的通知，一份就业信息报翻得哗哗响。3人挤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书房，书、电脑、衣物堆满了整个屋子。

去年从北京市一所文科院校毕业的何亮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因为收入太低，只干了3个月就辞职，之后和一名同班同学一起四处跑招聘会。何亮说自己现在很后悔毕业时没有南下广州找工作，班上几个去了的后来都混得不错，“可是来回路费要1000多元，我当时上哪里去凑钱呀？”

何亮的室友张超给记者讲起了自己求职的经历。在去年学校双选会上，张超和同系的一名同学竞争一个广告员的岗位，结果就因为对方考过驾照而胜出。张超说，文科类的专业不像工科，很多东西难以量化，考试内容也很难拉开差距，疯狂考证成了周围同学求职的“杀手锏”，但是考驾照、考注册会计师证、项目管理师四级证、助理经营师证、日语



三级证，每个本子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像我们这样的家境，想都不用想。”

张超刚跑完一场招聘会回来，他指着身上已经有些起毛的西服笑言：“就是这套求职服，毕业时花了我500元。”张超介绍，一份简历3元，一张门票10元，然而仅凭一份简历、一次招聘会是很难找到好工作的。为了找工作方便联系，当时一咬牙还买了个手机，每月话费差不多100元，此外还经常要请人吃饭打探消息。

据调查，大学生求职成本平均需要4000元左右，与其他大学生不同的是，贫困大学生要面对经济上的拮据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压力，窘迫的家庭经济加剧了就业难度。

“竞争还未开始，我们就处于劣势了。”张超感慨，贫困毕业生大多来自农村或下岗职工家庭，在其父母的眼里，他们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原本想的是毕业后就能“脱贫”，可残酷的就业状况打破了美好的梦。

经济困难，造成了贫困生就业投入成本的不足，没有可依靠的“人脉”更使他们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资源，进而导致他们心理上的焦虑和自卑。张超介绍，班上的贫困毕业生多来自“老、少、边、穷”地区，在“父亲就业时代”来临之际，贫困生们只能“望职兴叹”了。

武汉科技大学学工处负责就业指导的孔波介绍，由于家庭贫困，不少大学生性格偏于内向，即使成绩优秀，在参与招聘活动时也往往因为不善表达而“走麦城”；同时，贫困使得他们常常兼职赚取生活费，不可避免也影响了学业；与此同时，有些高校甚至以不还贷为由扣发毕业证、学位证，使得贫困生找工作难上加难，更没有办法按时还贷，由此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还钱声声如念紧箍咒

孙丽说这辈子最难忘怀的是除夕的那碗牛肉面。

2003年9月，孙丽带着县民政局开具的贫困证明和学校发的家庭情况调查表只身来到江城武汉求学。从老家到武汉，她身上仅带了1000元，还是在学院老师的帮助下才通过“绿色通道”办好入学手续，4年贷款两万元，还款期限是2007年7月到2011年7月。

去年7月，孙丽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设计工作，拿到手的钱，每月1800元。房租要500元，水电费控制在100元以内，上班路费250元，通讯费尽量不超过50元。吃饭控制在300元左右，周末就吃两顿。生活用品控制在50元，主要是牙膏、洗衣粉、洗发水之类，就这样，孙丽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在一张专门开的账户上存入500元。“差不多一年了，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孙丽一直庆幸自己身体不错，“万一有个病痛，还钱计划就全黄了。”

年前，眼看着同事都在订票打点行装，孙丽打起了“小算盘”——从上海到老家，来回火车票、汽车票就是1200元，给年迈的父母买点补品，给读高中的弟弟买件新衣服，还有年长的亲戚、年幼的侄子，估计2000元都不够花。最后孙丽选择了留守公司，值班还能得笔小钱。除夕那晚，孙丽就吃了一碗牛肉面过了年。

孔波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国家助学贷款在6到8年内还清，去掉上学时间，毕业4年内要还清，如果一个学生4年贷款3万元，利息国家承担50%，还要支付将近6000元。则每年的债务负担将近900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很多大学生异地求学、异地工作，毕业后还需负担房租、交通、通讯等费用，况且刚刚参加工作，工作经验缺乏，收入水平不可能很高，很难想象他们可以用4年的时间还清这些贷款。

在疲惫中感恩

先还钱还是先买房？这个问题曾经让赵俊峰烦恼了很久。

赵俊峰2004年从武汉科技大学材料专业毕业，随后进入湖南一家钢铁公司，月收入刚涨到3000元。两年时间，穷苦出身的赵俊

峰硬是攒下了5万多元，该给银行还钱了，可这时刚好有个机会——女朋友的单位集资建房，两人如果凑在一起交够10万，一年后就就能拿钥匙了，到底是该先还钱还是先买房？赵俊峰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先还钱，房子的事情晚点再办。没想到长沙的房价“嗖嗖”地疯涨，赵俊峰的工资是无论如何赶不上趟了，交往3年的女朋友一气之下只身去了广州，从此再无音讯。

“因为还贷我错过了太多，但我从不后悔。”赵俊峰说助学贷款让自己从农村走进了城市。他至今记得，自己怯生生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是辅导员领着自己跑前跑后办了助学贷款；记得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是室友隔三差五带着他一起吃饭；记得那年寒假做勤工助学，在班主任家吃的那顿年夜饭饺子。“人要懂得感恩，每一个对我有过帮助的人，关爱我的社会，我都不会忘记。”

在大学里圆梦，在疲惫中感恩。父母亲情成了寒门学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轻轻地触碰，常常是撕心的疼痛。刚刚过去的春节，王飞冒着大雪赶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了。为了还贷，大学毕业两年多没回过家，刚刚还清债务的王飞如释重负。大年初二，王飞眼瞅着父亲到处找鞋子，最后拿出来的一双皮鞋还是自己当年考上大学时大伯送的，因为破了几处，毕业时托运顺便捎了回来，而今已经被父亲里里外外补了好几层，那一刻，王飞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好跑进自己房间，眼泪哗啦啦就流下来了。

王飞说，每次跟同事出门，最怕看到的就是他们给家里寄营养品、衣服、当地的土特产之类的。而自己想得更多的还是：下雨了，家里的墙壁是不是在一层层地掉皮，是不是还要大盆小盆地接漏雨，什么时候有钱能翻修一下呢？

“十几年寒窗，我们依然弱势”

回了老家，王强最大的感触就是，“大学生在乡亲们眼里的地位下降得太多了”。

10年前，王强考进县一中，一起玩到大的邻居王刚分数不够只好进了交钱就能上的一所中专。

10年后的今天，王强和王刚同在一个城市打拼。

王强大学毕业进了一家科研院所，早涝保收一个月2000元不到。

王刚7年前就来了，开始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山里孩子肯吃苦、嘴巴甜，有了学校的理论知识加实际操作，王刚的技术很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杨怀锁 陈培营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163.com

时政点击

期待更多城市推行全民医保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职工年内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意味着北京在全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率先实现了医保全覆盖。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存在着覆盖面过窄的缺憾，2000年曾因此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对于191个国家“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处于倒数第四的位置。为此，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为扩大“医保覆盖面”而努力，在农村，开始有“新农合”和农村医疗救助，在城市，有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医疗救助，这些制度相辅相成地构成了一个“覆盖全民”的“制度闭环”。

从政策设计到制度安排再到目标实现，终归还有一个过程。就北京而言，2001年实施城市职工医保，2004年覆盖到农民工，2007年出台“一老一小”，城镇居民医保覆盖面已经大大扩张。但2007年“城镇职工年内无业居民”，依然是“覆盖全民”的“短板”。

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实际上取决于桶这个水桶的桶板中最短的那一块。现在，新制度终于补上了这块短板，而且最令人欣慰的措施就是“低保、生活困难补助和重残人员免费参保”。其实，这部分人在北京也就6万来人，财政花上1.4亿，“以人为本”的政策结果则是中国社会梦寐以求的“全覆盖”。

从理论上说，医疗保障针对的是疾病风险，而疾病风险与老年、失业、生育、工伤等风险相比，有个重要的差别：其他风险，都是在人生某一年龄段才会出现，因此，相应的保险项目可以有纵向的自己的自己储备积累，也可以有横向的参保群体之间的再分配和互助共济，回旋余地相对较大。疾病风险则是一个人一生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风险，什么时候花钱，花多少钱，其不确定性更大。

但是，就一个人群而言，患病的几率会随着人群规模的扩大而趋向一个常数。统筹层次越高，覆盖范围越大，参保人数越多，这个客观存在的常数就越明显、越稳定。所以，抵御疾病风险，从成本效益看，自己承担实际上是划不划算的，更可靠的办法是依仗群体中横向的再分配和互助共济；与此同时，他们也就不再有了在自己生病时获得帮助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无论国际国内，公众对经济、社会风险的排序中，疾病风险总是第一，而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立法也就是1873年在德国诞生的“疾病保险法”。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全民医保还需要考虑到目前尚未进入“保险箱”的外来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在北京正常纳税做贡献，这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健康权和生存权一样，都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因此，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希望北京市医保能补上外来儿童这块最后的一块“短板”，让所有纳税者的孩子共享在医保阳光之下。如此，可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上升。希望有更多的城市效仿北京，希望医保的阳光覆盖所有的公民。 京文

奢侈环保袋“污染”环保精神

有人做过测算，实施“限塑令”后，中国塑料袋的使用量将减少至少2/3，“限塑”对于环保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除此之外，“限塑”竟也衍生出一种新兴时尚……主妇们争相互赠环保袋以作流行，名牌旗舰店竞相挂出价值不菲的帆布购物袋，出门背一个设计新颖的环保袋似乎比捂着名牌皮制手袋更时髦……一家LV专卖店的店员告诉记者，一款名为“这就是爱”帆布包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卖完，“价格在10000元左右。”（《广州日报》6月18日）

环保购物袋，作为工具，只要简单实用即可，奢侈时髦，太没有必要。怎样花钱，如何消费，属于个人行为。但是怎样花钱，如何消费，却又折射出非常深刻的道理。气候变暖，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资源的大肆使用对于环境的巨大损害；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的稀缺，让我们体会到人类对于自然

的索取是多么的毫无节制……今天所享受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都建立在过度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上。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一边学会放弃“塑料袋的污染”，又一边尝试着接受另一种形式的资源过度消耗——倘若如此，限塑令推行的“环保成果”就会被冲抵，而我们，仍旧会陷入毫无节制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某种意义上说，奢侈环保袋比塑料袋更“污染”。塑料袋污染的只是环境，可奢侈环保袋之类的事物不仅消耗资源，还侵蚀我们的心灵。环保不是口号是行动，环保不是面子是责任，在奢侈主义的烙印下，是财富的无序挥霍和浪费，是传统人文理念的流失，是伦理道德的异化和扭曲——奢侈环保袋的存在和流行，对于环保精神来说，是赤裸裸的亵渎和践踏。 陈一舟

让着装礼仪在实践中“规范”

日前，荣阳市法院召开媒体发布会，公开该院绩效考核办法，向媒体通报了该院出台的两个文件：《绩效考核办法》及《绩效考核细则》。不得染彩发、化浓妆、纹身、染指甲，男干警不得留长发、蓄胡须、剃光头……如此规定一出台，有人说其苛刻，有人则批评这些规定“管得太宽”。

何必规定一出台就一口否定呢？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法官这个职业，穿着仪表过于“个性化”，要说一点不影响其职业形象那是假话。诚如荣阳市法院院长杨发群所说：“着装礼仪直接关系着法官的形象和审判的权威。”但该院的规定是否是最科学合理的，则另当别论。不妨宽容其存在，让其实践一下，让实践说话，如何？

据悉，北京市已有了《北京市公务员礼仪规范》。有乘车、介绍中的礼仪规范、握手的礼仪规范等十二项规范，其中就有服装中的礼仪规范和礼仪场合的

仪容规范。我们暂且不论这些规范是否就是最标准的，但起码是一种文明的倡导。

让着装礼仪在实践中“规范”。无论是荣阳市法院的着装礼仪规定，还是北京市公务员的礼仪规范，都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与完善。众所周知，中国是礼仪之邦，古来就有一整套的礼仪规范。当然古时的礼仪规范带有明显的权贵色彩，不值得今人效仿。但并不是意味着现代人就不需要礼仪规范，尤其是公务员。

崇尚个性，张扬个性，尊重个性，并不代表着放弃着装礼仪的规范。事实上，个性的张扬也不是奇装怪服或怪模怪样所能涵盖，那便是对人性张扬的狭隘理解。着装礼仪的规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要有一个哪怕是成熟的“规范”或规定，再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保留个性化基础之上的逐步“规范”。 冬雪草

死人成“摇钱树”是和谐社会之耻

为抢“死人”而刺伤活人的事，你听说过吗？6月17日重庆沙区双碑东华医院太平间便上演了这一幕，3家殡仪社同时要求拉走死者，为了争夺死者，其中两家大打出手，最后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抢救三小时后仍未脱离危险。

为了抢“死人”而刺伤活人，咄咄怪事，天大笑话。虽为个案，但已足以说明：时下殡葬业之乱，已乱到何种程度。3家殡仪社抢“死人”，等于抢生意、抢钱。2003年以来，殡葬业一直名列“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榜单，一个骨灰盒能有2000%的利润。“死人”成为一些人的“摇钱树”、“发财工具”，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抢死人刺伤活人现象，只是再次“劲爆”了殡葬业之暴利而已，或者干脆说，都是暴利惹的祸。

殡葬业为何能获得暴利？在于一个“乱”字，乱收费、乱涨价司空见惯。归根结底，主要归因于监管的不力与法律的滞后。3家殡仪社抢“死人”，是在抢谁的钱？毫无疑问，抢死者亲属的钱。与殡葬业的暴利相对应的是民生之艰，百姓不是叹息“死不起人”吗？面对3家抢死人遗体闹剧，死者亲属岂不痛上加痛？

死人成“摇钱树”是和谐社会之耻。公众迫切期待民政部门管齐下，真抓实干，尽快终结殡葬业的暴利时代。 王厚载

争抢高考状元名校的“形象工程”？

高考分数一公布，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名校状元争夺战”就要打响。这场战斗分外惹眼，硝烟四起。偷猎几个近年例子，可见一斑。

2004年6月江南时报报道，北大清华争抢江苏常州理科状元。

同年7月新华网报道，为抢到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清华和北大的招生老师都在他家“守”了4天。最后，清华获胜。北大清华又瞄准江苏“高考文科状元”。北大老师说，只要上北大，系科随便挑。最后，北大获胜。

2005年6月新华网报道，山东高考文理状元浮出水面，受到清华北大争抢。

2007年7月北京青年报报道了“清华北大争抢重庆文科状元”的消息。报道称：“重庆文科状元曾表示将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清华砸两万元的奖学金请他报清华。”

2008年5月新京报报道，清华大学从今年8月起，各省高考状元或获得国际奥数金牌，并最终进入清华学习的学生，获得新生奖学金的额度将从去年的2万元提到4万元，同时还将获得今年新设的优秀新生海外研修奖学金。

《1999—2007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在调查到的高考状元中，选择北大清华的状元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这两所高校作为中国顶尖大学，吸引高考状元多是正常的。但是年年这样“点对点”地争抢，就有点不正常了。一所高等学府，本应以自己的学术风气、研究水平、教学质量、国际地位等去吸引学子，而不是以“优惠政策”、“金砖银弹”去拉拢学子。这样做，不成做买卖了吗？

北大清华的地位在中国是无人能及的（当然不是拿到国际上）。但是有一些人有个思维惯性，就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之类，非得比出个高低上下的座次来才罢休。至于北大清华是不是这么想的，不能肯定。但是争抢高考状元的举动，却像这么回事，甚至有点两败俱伤。比比谁推中国学府牛耳的嫌疑。

然而比赛有了变化，“新选手”来了。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因香港高校逐步纳入内地统一招生计划，并以高额奖学金、与国际高度接轨的办学体制和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等为筹码，向北大、清华发起挑战。报道称，恢复高考以来，高校间“状元争夺”经历了“群雄逐鹿”、“北清时代”，现已进入“三国争霸”。

应该说，参与竞争方越多，竞争的公平性就越易得到保证。但是高等学府招录人才，绝不能等同于寻常的商业竞争。靠砸钱来拼，甚至不敢争抢状元变成“形象工程”，那样的胸襟实在不敢恭维。 陈龙正